

明代河北地区西夏遗民相关问题杂考*

徐成**

초록 근래 학계에서는 허베이(河北) 지역에서 가장 늦은 서하(西夏)의 후예가 만력 연간에 진주(河北晉州)에서 활동한 이분(李蕢)이라는 설이 제기되었으나, 이러한 설은 관련 비각 사료에 대한 오독이 발생한 상황에서 제기된 것이므로 재검토가 필요하다. 이런 주장은 문제가 있다. 그러나 허베이(河北) 지역에 서하(西夏)의 후예와 관련된 집단이 존재한다는 점은 성립될 수 있다. 예를 들면 명나라 허베이 바오딩(保定)의 위소무관(衛所武官) 중에는 서하의 후예와 밀접하게 왕래하는 “달관(達官)” 차이씨(柴氏) 가문이 있다. 이것은 서하와 연관된 사람들 속에서 명나라 위소체제에 융합된 전형적인 사례다.

명나라 전기 위소에는 많은 원나라 몽골, 색목(色目)의 유민(遺民)들이 편입(編入)되었는데, 그들 중의 무관을 “달관”이라고 부른다. 허베이성 바오딩 지역의 “달관” 집단 중에는 서북의 서하 고지(西夏故地)에서 이주한 차이씨(柴氏), 안씨(安氏) 가문이 있다. 그 중 차이씨는 흥선사와 밀접한 관련이 있으며, 족내(族內)에 일찍이 이 절을 보시(布施)하고 수리한 사람이 있었고, 또한 족속들이 서하문경당(西夏文經幢)에 이름을 올렸다. 차이씨 가문은 흥선사(興善寺)의 서하식(西夏式) 티베트 불교(藏傳佛教) 활동에 적극적으로 참여한다. 차이씨 가문은 서하 유민(西夏遺民)과 깊이 교류한 몽골인일 수도 있고, 심지어 당항(黨項)의 후예일 수도 있다. 이 달관의 세습은 명나라 말 숭정 연간에 지속되었으며, 명나라 원시 서류(明代原始檔案)에 기록된 비교적 대표적인 서하와 관련이 있는 사람들이다.

주제어 허베이 바오딩(河北保定), 위소(衛所), 달관(達官), 서하(西夏), 몽골(蒙古)

* 본문의 작문은 섭홍음(Nie Hongyin) 교수님의 지적과 세 명 심사위원의 의견에 감사드립니다.

** 남개대학교 박사과정 수료

1. 引言

西夏灭亡后, 遗民离开故土, 或仕宦、或从军、或务农, 星散四方, 与各地其他族群混居杂处。在元代, 他们被称为唐兀、唐兀惕、唐忽惕, 西夏政权有时也被称作唐兀氏, 部分遗民也以唐兀为姓氏, 有时西夏故地包含党项、汉人在内的人群也被统称为河西, 总体上都被归类为色目人中的一种。¹ 而什么是色目? 按《元典章·刑部》载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 “未审何等为色目人? …… 除汉儿、高丽、蛮子人外, 俱系色目人有。” 作为色目族群, 西夏遗民在元代总体上获得了较多的出仕机会, 有的与汉人等族群密切交往, 还生产了一批水平优秀的文学著作。² 总体上, 有学者甚至考证, “元代的唐兀人已不再单纯指代西夏王国的主体民族党项人, 而是涵盖了原西夏王国境内所有党项、汉人、鲜卑、沙陀、回鹘、女真、回回、吐蕃等民族在内的一个大型政治共同体。”³ 因此, 西夏遗民的问题是复杂的, 族群来源是多元的, 在研究时不能不加以注意。

对西夏遗民族群问题, 学术界虽然已做出了不少探讨, 但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他们在元朝的活动, 西夏遗民族群在明代的活动, 还存在不少空间值得挖掘。⁴ 作为蒙元的属民, 包含党项故族在内的西夏遗民不少已受蒙古化的熏陶,

1 刘浦江(1998), 「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 『大陆杂志(台北)』总第96卷第6期, 第19-34页。

2 据学者考证, 色目中的唐兀人“虽居边域, 号有华风。元代唐兀文士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创作成就”, 参多洛肯(2018), 「民汉文化交融中的元代唐兀氏文人群体」,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第95-101页。

3 邓文韬(2022), 『元代唐兀人研究』,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4 关于西夏遗民的研究综述, 参看 杨富学(2004), 「20世纪西夏遗民研究」, 载杜建录 主编, 『二十世纪西夏学』,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第223-233页; 张琰玲(2018), 「百年西夏遗民研究综述」, 『西夏研究』第3期, 第109-114页。最近关于西夏遗民的专著有 张琰玲(2019), 『西夏遗民文献整理与研究』, 南京: 凤凰出版社; 杨富学(2022), 『述善集与河南濮阳西夏遗民研究』,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年; 邓文韬, 『元代唐兀人研究』,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22年。对明代遗民碑刻的整理参看 杜建录(2015), 『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杜建录·邓文韬(2022), 『党项与西夏碑刻题记』, 西安: 三秦出版社。

其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明代,⁵ 所以研究明代西夏遗民的问题, 不仅仅是西夏学的范畴, 也是研究明代蒙古史、明代民族史的有趣的话题。本文试图对河北地区的明代西夏遗民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对部分新说加以发覆,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碑刻与传世文献进行考察, 部分观点也存在推测, 所以不当之处必然不少, 敬请学者指教。

2. “河北晋州最晚西夏后裔说”的商榷

最近出现的关于明代西夏遗民的新研究, 认为: “河北晋州发现的明万历六年(1578)『晋州重修儒学明伦堂记』清楚地记载了晋州判官李蕢为西夏后裔, 为学界提供了明代西夏遗民在河北活动的新线索, 这是目前所知明代西夏遗民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晚记录。”⁶ 但是这个观点是存在问题的, 是出于对碑刻的误读。

该文的核心观点认为, 『明伦堂记』碑第20行落款“判官西夏李蕢”, 就是『(乾隆)宁夏府志』与『(民国)晋县志』中记载的宁夏恩贡李蕢, 并进一步提出: “党项嵬名氏在唐代安史之乱时, 因平叛有功被赐姓李, 则李蕢有可能出身西夏皇族嵬名氏。正是由于李蕢西夏后裔的身份, 而宁夏又是西夏故地, 故用西夏来指代其籍贯宁夏。也有人疑问西夏是否陕西宁夏的省称, 就目前来看无论史籍记载还是习惯都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例证。”⁷ 然而明代碑刻乃至方志中关于“西夏”的记录表明此处立论或许可以商榷, 事实上明代石刻也有将宁夏称为西夏的情

5 近来关于明代西夏后裔的论文, 对西夏人蒙古化问题考证详细者, 可参 聂鸿音(2022), 「明代党项人的党项姓和蒙古名」, 『西夏研究』第1期, 第27-32页, 该文首度专门揭示了明代党项人使用党项姓、蒙古名的现象, 阐明了明代党项后裔的文化认同。

6 陈瑞青·郭兆斌(2023), 「明代西夏遗民的最晚记录: 晋州明代西夏后裔遗迹考」, 『西夏研究』第1期, 第3-11页。

7 陈瑞青·郭兆斌(2023), 「明代西夏遗民的最晚记录: 晋州明代西夏后裔遗迹考」, 『西夏研究』第1期, 第6页。

况, 举两例如下:

一, 陕北绥德合龙山『合龙山新建玄帝行宫碑记』, 碑立于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 由山东按察司副使整饬霸州道兵备郝汝孙撰文。碑文言:“州西南五里许, 有山曰合龙山, 其名所由传旧矣。其络理自西夏而来, 蜿蜒连绵亘二千里, 注于此, 左右两溪夹之, 莹澈若玉。”⁸ 文中显然是说合龙山从宁夏蜿蜒过来, 而非西夏朝代。

二, 宁夏博物馆藏“侯廷珮墓志”, 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兵科左给事中李应策撰文。其文云:“初公之降割冢嗣也, 哭之恸。明年春二月, 遂遘病, 未几, 卒于京邸。余颇为经纪其丧。其配孟孺人哭几毙, 已, 乃忍死扶公父子丧归西夏。”志主侯廷珮, 字长德, 号泰和, 祖籍应天上元, 占籍并葬于宁夏。⁹ 而其友人李应策谓其归葬“西夏”。

即便到了清代, 也偶见将宁夏(银川)称为西夏。乾隆三十三年编纂『(乾隆)重修和顺县志』的贾诩就曾在序言中说:“邑(指和顺县)旧有志, 创始于万历十一年西夏李公继元, 重辑于顺治十三年上谷李公顺昌, 三成于康熙十四年钟山邓公宪璋, 凡所志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选举、灾祥、艺文者亦綦详且尽矣。”¹⁰ 这里的“西夏李公继元”即曾经担任和顺知县的宁夏人李继元。¹¹ 由此可以看出西夏作为宁夏(银川)别称的时间之久。

延展来看, 用古时地名、方国、朝代指称自己的郡望、籍贯或者先祖源流, 在明代乃至其他朝代并不罕见, 比如明代苏州医家陈履端在其重辑宋本『幼

8 [明]郝汝孙(2017), 『合龙山新建玄帝行宫碑记』, 载韩学亮, 『绥德古代碑刻』,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第76页。

9 [明]李应策(1599), 『明故文林郎刑科都给事中泰和侯公墓志铭』,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碑刻。

10 [清]黄玉衡 修, [清]贾诩 纂, 『(乾隆)重修和顺县志』卷首序言, 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刻本, 第19a-19b页。

11 李继元, 字寿轩, 万历癸未拔贡。任山西和顺县知县, 年老告休未回籍, 和顺大荒, 继元曰:“此颠连者皆吾赤子也。今虽去位, 不得请, 何忍坐视不救?”遂倾囊中积约二千金粟粟捐赈, 邑人感其德, 立生祠祀之。参看[清]张金城 修, [清]杨浣雨 纂, 陈明猷 点校(1992), 『(乾隆)宁夏府志』卷16「人物四」, 宁夏人民出版社, 第574页。

幼新书』序言中自署“古吴陈履端”,¹² 原籍北直隶(河北)、军籍太原左卫的甘肃总兵王玺在其『医林类证集要』自署“孤竹王玺”,¹³ 更有名的则是画家唐伯虎因家族供奉的先祖莒国公唐俭封地在山东,而自题“鲁国唐生”。¹⁴ 因此李蕢自署西夏,是可以理解的。“西夏李蕢”一词,应该指的是宁夏而非西夏国。如果一定要证明李蕢是西夏李氏皇族,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文献证据。因此,该文由此阐发的西夏皇族后裔李蕢在万历朝出仕晋州,且为目前已知最晚的明代西夏遗民活动记录,这一结论可能言之尚早。

可以进一步思考,李蕢所处的明代宁夏是否还聚居有一定规模的西夏皇室后裔。首先需要追溯到明朝初期对宁夏的经略史事。按庆靖王朱楠编修的首部『宁夏志』记载,宁夏在“国初(洪武初)立宁夏府。洪武五年废,徙其民于陕西。九年命长兴侯耿炳文弟耿忠为指挥立宁夏卫,隶陕西都司。徙五方之人实之,后增宁夏前卫,宁夏左屯、右屯、中屯为五卫,寻并中屯于左右二卫为四卫”,¹⁵ 成化间宁夏『重修儒学碑记』云:“我朝平定天下,改宁夏府,寻以其地密迩戎疆,尽徙其民于内地,置兵卫以守之。而又莅以亲藩,总以内外文武重臣,于是城郭之固,人物之殷,兵马之雄壮,屹为关中之巨防矣。”¹⁶ 文字看似美好,实际上按时人俞本『纪事录』的记载,洪武五年明廷废宁夏府并迁徙全府居民,是由于“冯胜惧回鹘之兵,将甘州所葺城池、营房、仓库、转运米麦料豆二十余万石及军需尽焚之,弃城归,并宁夏、西凉、庄浪三城之地亦弃,仅以牛羊马驼令军人赶归,途中倒死者,军虽饥,不敢食,仍负荷归,军人饿死

12 [宋]刘昉 编, [明]陈履端 重辑,『幼幼新书(附拾遗方)』卷首序言部分,明万历十四年古吴陈履端刻本,第3a页。

13 [明]王玺 编撰,焦振廉 等 校注(2016),『医林类证集要·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第1457页。

14 王连起(2018),『唐寅书画问题浅说』,载王连起,『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王连起卷·下』,北京:故宫出版社,第775页。

15 [明]朱楠 编修,胡玉冰,孙瑜 校注(2015),『(正统)宁夏志』卷上「沿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4页。

16 [清]张金城 修, [清]杨浣雨 纂,陈明猷 点校,『(乾隆)宁夏府志』卷19「艺文二」,第697页。

载道，一无所问。”¹⁷

朱楠是洪武二十六年奉命就藩宁夏的，距冯胜弃地、耿忠管卫等事件相隔不算太久，而且他又有镇守当地的使命，¹⁸ 近水楼台使他对本地军政事务的变迁有所了解。因此，他在『宁夏志』中对弃地徙民的叙述，结合时人俞本的记录，验证了宁夏遭弃又重新移民实边的真实性。所以，即使假定西夏皇室在明初尚住在宁夏，冯胜弃地事件发生后，宁夏府也基本成了一座空城，之后明廷干脆废止宁夏一带民政区划的建设，直接改设军事卫所建置，并从全国各地召集人口充盈其中。在这个过程中，宁夏府的人口实现了腾笼换鸟般的变化，很难证明还有成规模的西夏皇室遗裔继续定居。

李蕢的科举信息来自『(乾隆)宁夏府志』，其中记载宁夏府城(明代宁夏镇城，即今银川)出身者不额外标注，若出身中卫等地则标注“中卫”，也就是说，李蕢是镇城人。镇城只有卫所建制，含宁夏卫、宁夏前卫、宁夏中屯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及宁夏中护卫，意即李蕢的户籍就在这些卫所之中。明代宁夏长期缺少府县之类建置单位，仅设都司卫所体制和镇戍制的镇路堡等防区体制，所以大部分民众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军户，也就是朱楠『宁夏志』所说的“徙五方之人实之”。宁夏地区现存的武职原始档案『宁夏前卫选簿』和『宁夏中屯卫选簿』的记载也基本符合这一趋势，大部分武官来自相对靠东部的地域，有来自江淮地区凤阳、定远、滁州、仪真的，也有来自江南常州、仁和的，还有来自中原夏邑、临漳等地的，达官较少，罕见祖籍西北出身的武职。¹⁹ 因此，李蕢

17 [明]俞本撰，李新峰笺证(2015)，『纪事录笺证』卷下「洪武五年壬子」，北京：中华书局，第368-369页。学者考证，洪武五年岭北之役中，冯胜西路军虽获得了胜利，但由于他彻底放弃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的广大地域，不仅使西路军的战略成果化为乌有，还造成一片空城，到洪武五年末的甘肃行省几为一个无人把守的军事真空地带。参看赵现海(2011)，「洪武初年甘肃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政策」，『古代文明』第1期，第77-90页，第113-114页。

18 庆王与韩、沈、辽、宁、齐、燕、谷、代、晋、秦、肃诸王“皆塞王也，莫不敷险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明]何乔远，『名山藏』卷36「分藩记一」，南京：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第1968页。

19 『宁夏前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6册，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8-521页；第57册，第7-78页。

很有可能就是宁夏卫所体制内的、一名祖籍外地的军籍学生，通过恩贡入仕，其先祖几乎不太可能是西夏皇室。

若问为什么李蕘自署代指军籍宁夏的西夏，而非自署其祖贯本籍，这是个人的署名自由：比如明后期名将董一元，军籍宣府（雅称上谷），祖籍崞县，驻扎古北口时他自署“崞县董一元”，²⁰而到了他镇守昌平时又自署“上谷董一元”；²¹再比如名将杨四畏，祖籍桐城，军籍定辽左卫（辽阳），他曾署名“桐城杨四畏”²²及“辽阳杨四畏”。²³可见，明代同一人时而署祖籍、时而署名现籍的现象是不罕见的。

此外，我们还要额外说明一点，明代的“宁夏”一词，概念大致与明初宁夏府、明中后期宁夏镇的区域相吻合，也就是包含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北部大部分地域。作为军事建置，其核心是“宁夏镇城”也就是今天的银川，包含了宁夏前卫、宁夏中屯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宁夏后卫、宁夏中卫等卫所，但并不包含今天固原卫、固原镇等区域（也就是今天宁夏自治区固原市等宁南地区）。²⁴换句话说，明代以“西夏”指代的“宁夏”，主要指的是包括今天银川市、中卫市、吴忠市、石嘴山市在内的“宁夏镇”区域，多数情况下是不包含固原镇（约今固原市）区域的。

20 「滦平县隆庆四年戚继光张永安鼎建碑」，载向燕南 主编（2016），『中国长城志·文献下』，南京：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第2338页。

21 「河北怀来样边长城鼎建碑」，载向燕南 主编，『中国长城志·文献下』，第2338页。

22 「头道关东四楼修城碑」，怀柔区文化委员会 主编（2018），『怀柔明代长城』，北京：燕山出版社，第134页。

23 「隆庆四年修城碑之二」，『怀柔明代长城』，第147页。

24 详参谭其骧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

3. 明代保定地区的西北达官及其与兴善寺的关联：柴氏家族与西夏族群的关系推测

虽然“晋州判官李蕘是明代河北最晚的西夏后裔”这一说法证据不成立，但是明代河北地区有西夏相关人群的活动，却是不争的事实。朱元璋“驱除鞑虏”、洪武易代后，党项故族由元朝子民变成了明朝的子民，被政府编入卫所从军成为党项遗裔的落脚点之一。明代卫所武官中，以元代归附者为主的达官群体里存在着与西夏密切相关的人群。本节介绍这部分人群即河北保定卫所中来自西北塞外西夏故地的达官群体，他们与保定地区的党项故族关联密切，亲自参与党项后裔的佛教活动，典型的案例是他们与保定兴善寺及寺内西夏文经幢的关系。

兴善寺²⁵是元明时期保定地区的佛教寺庙之一，莲池公园所藏明代西夏文经幢便是为兴善寺沙弥所造，文载：“大明弘治十四年，兴善寺院内沙弥班丹朵只四月二十四日命终。十五年修造此幢，命写刻『胜相总持』毕。造幢者並尚吒失领占。”²⁶此寺的兴修源流，可参看清初郭棻的『重修兴善寺记略』：

郡城东南隅之有兴善寺者，不知创自何时，明永乐宣德间碑皆记重修也。元时碑没灭不可读，历今三百年矣。风雨损之，鸟鼠害之，苔绣香台，嗽纲佛座，瓴甃栋宇，缺落摧圯，缁衣者流，望之却步。寺有枣数株，异于他种，每秋熟时，儿童摘食之。乃有人履迹过此，则狐兔窟也。嗟乎！佛教盛于中国已久，独此寺衰废一至于此，地为之乎？人为之乎？抑时为之乎？我朝定鼎之十年，郡置

25 兴善寺遗址的大约位置，按笔者的调查，大约在保定古城墙的东南角，比邻曾经的养病堂、七圣庵，正好位于泰山行宫的正东侧。从今日的行政区域看，属于莲池区天威中路一带。根据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清末《直隶省城街道全图》，绘制此图的当时，兴善寺已被该为兴善堂。按当地老一辈人士的说法，养病堂及兴善寺等遗址，从清末民国以来，先后被多所医院及河北省卫生厅占用，今为保定市妇幼保健院。现已完全看不出有寺庙痕迹。

26 参考 聂鸿音 译文，见所著「保定莲池公园所存西夏文“胜相经幢”考」，郭健 主编(2022)，『燕赵文化研究』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11页。

防守官兵有分得拨什库哪杜者，蒙古人也，性明敏而好善，与人谦以和。时四方督兵大率掠也而获之，氓也而俘之，且株连，且罗织，茹苦者吞声。公独洁己而严，其部丁人感德之。公驻节处密迩兴善寺，恒顾而嗟叹焉，遂捐资募众，躬率经营。常于烈日尘土中手运木石，刻期告竣。复延僧清濡为住持，置园田五亩五分五厘供苾芻。所修殿三楹、配殿六楹、钟鼓两楼、禅堂六间，且高其门以庄观，杆其旗以表盛，而丹垩金碧之功，罔弗备焉。呜呼！天下事盖有地人与时之相，须数百年而一际者，有如此举也。读明碑所记，当日重兴此寺卓锡者则班丹端竹也，焚修者失囉坚参与其徒班丹朵尔只也，檀越则达官柴武也，莫非西土人。今哪杜公亦西土人，相去三百载而重修之，惓惓乎若有所感而动者，其非时至则然乎？地之灵也，佛之灵也，吾不能不为深感焉。时康熙十年三月。²⁷

可以看出该寺至迟在元代就已经存在，明永乐、宣德间都曾经历重修，到清康熙初年已摧圮，故由驻防八旗武官哪杜重新修葺。碑中所记的一个信息便是当时首先来到寺院居住修行的三个僧人和资助寺院的“檀越”(dānapati, 施主)。三个僧人的名字一班丹端竹(dpal ldan don grub, 具德成就)、失囉坚参(shes rab rgyal mtshan, 慧幢)、班丹朵尔只(dpal ldan rdo rje, 具德金刚)都是藏语,²⁸ 郑绍宗、王静如二先生考其为藏族喇嘛教所用，兴善寺乃藏传佛教庙宇。²⁹ 聂鸿音进一步对勘出班丹端竹就是二号幢第八面第二行之首的姓名，班丹朵尔只即一号幢的墓主班丹朵只，³⁰ 而达官柴武尚需进一步考察。事实上在明代原始档案『武职选簿』中保定各卫的选簿里记载有柴氏、安氏等来自西北的达官家族，其中保定左卫右所柴氏家族的达官柴武活动于成化、弘治年间，值得注意。

27 [清]李培祐等修，[清]张豫垠等纂，『(光绪)保定府志』卷77「杂记·寺观」，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第3a-3b页。

28 聂鸿音，「保定莲池公园所存西夏文“胜相经幢”考」，第216页。

29 郑绍宗·王静如(1977)，「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考古学报』第1期，第139页。

30 聂鸿音，「保定莲池公园所存西夏文“胜相经幢”考」，第216页。

关于保定达官,学界已从其编制、安插、征发与运作等各层面进行了详尽梳理。³¹但关于达官中的具体个案,尤其是相关的家族史尚有发掘空间。考柴氏家族起源于塔滩地区,即大致以后套平原为核心,包含土默川平原及宁夏平原在内的地区,³²始祖柴林归附明朝,授保定左卫达官指挥同知。柴林子柴春,正统十一年(1446)承袭父职。柴春弟柴源,景泰元年承袭兄职,成化二年(1468)升都指挥僉事注本司带俸,成化五年升都指挥同知。柴源侄柴暹,成化七年优给出幼,长成袭职。柴源弟柴武,成化十二年以亲叔身份袭柴暹之职,弘治十四年(1501)身故,由其次子柴昂袭职。³³在世时间证明柴源之弟柴武即资助兴善寺的“达官柴武”。

刘浦江先生说:“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³⁴笔者深感赞同。而保定这两座西夏文经幢的助缘者中,有多位柴姓人士及武官,一号幢第八面题款中有柴百、柴契、柴依、柴由、指挥柴道,二号幢第八面题款有柴退、都指挥柴卯,³⁵指挥、都指挥都是卫所体系的武官,而遍查保定各卫所的选簿,达官中姓柴者仅有保定左卫塔滩柴林后裔这一支系,则经幢题名的柴氏诸人,应即保定左卫柴林后裔、柴武的同族。他们参与兴善寺的宗教活动,一方面能看出他们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与

31 相关代表性论文可参彭勇(2009),「明代忠顺营史实初识」,『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2辑,第11-22页,第404页;奇文瑛(2011),『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以辽东和京畿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第150-156页;周松(2011),「明朝对近畿达官军的管理:以北直隶定州、河间、保定诸卫为例」,『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第81-86页,第92页;周松(2012),「从西蒙古草原到华北平原,明朝忠顺营源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第39-49页。

32 周松指出塔滩亦称塔滩里、塔塔里,其核心位于塔滩山,在今后套平原,但明人所谓“塔滩”不仅包含塔滩山一带、东胜卫以西整个阴山山系及其山前平原,还包括宁夏贺兰山以北和西北的塞外之地,即元人朱思本所谓达达地。参看周松(2009),「塔滩新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

33 『保定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第258-259页。

34 刘浦江(1998),「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大陆杂志(台北)』总第96卷第6期,第19-34页。

35 史金波·白滨(1977),「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第1期,第146-147页。

党项族群来往的密切。由此推测他们可能属于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与党项后裔深入交往的塔滩蒙古人，再进一步大胆地揣测，他们也可能就是党项后裔。因为此西夏文经幢是迄今为止现存最晚的西夏遗迹，且其存在本身也证明了附近西夏族裔生活的痕迹，³⁶而柴氏一族参与此幢及此寺的修建如此之深，其反映出的情况显而易见。

笔者的基本论点是通过对照碑刻与传世文献，考订柴氏是与西夏遗民族群密切关联、深入交往的一群人。而柴氏可能是党项人，是笔者在前一基本论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猜想。因为“达官”一词，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前元蒙古族群，但也有相当多的案例证明，“达官”也包含除蒙古以外的许多族群，我们这里分别举例：

女真人。按《三万卫选簿》，该卫指挥使裴承祖的始祖裴牙失帖木儿，开元(原)女真人，原为元朝前店哈千户所达鲁花赤，归附后子孙世袭达官指挥；³⁷《三万卫选簿》还记载，该卫百户王凤翱先祖王塔失，元朝托温千户所千户，女真人，洪武十七年归附，授三万卫左所百户，世袭达官。³⁸

2. 回回人。按《锦衣卫选簿》，该卫达官猛可帖木儿、卜儿罕丁等人都是回回人出身，以达官世袭。

3. 河西达达。典型案例就是被当作蒙古族的河西达官吴允诚家族。按其去世后所立的神道碑来看，他的祖先“本河西大族，居亦集乃，仕元受王封，其族位伯侯者，累累有之。”³⁹那么，什么是河西？据刘浦江先生考察，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称之为河西，蒙古语转译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

36 Hongyin Nie (2023), “Tangut Pillars of Uṣṇīṣavijayā in Baoding Prefecture: The Last Monuments of Xixia Descendants,” *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Vol. 9, No. 2: 3-26.

37 『三万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139-140页。

38 『三万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243页。

39 [明]杨荣，「明故恭顺伯吴公神道碑」，载[清]张澍辑，今人周鹏飞等点校(1988)，『凉州府志备考』卷8，西安：三秦出版社，第400页。亦集乃，西夏党项语意为黑水，又名黑水城，为西夏西北部军事重镇，十二监军司黑水镇燕监军司治所。吴家先祖是西夏故地黑水城的世居大族，在明代也被当作河西达官。

“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⁴⁰ 韩国古代史料也可以佐证河西为西夏别称的事实：1268年，忽必烈曾亲口对高丽方面说：“昔成吉思皇帝时，河西王纳女请和曰‘皇帝若征女真，我为右手；若征回回，我为左手’。后成吉思皇帝将讨回回，命助征，河西竟不应，帝讨而灭之，尔亦闻之。”⁴¹ 这个河西王，就是西夏襄宗李安全，所献的女儿就是察合公主。

此外，许多族属不能进一步彻底明确的达官，则被模糊地标记为“山后人”。综上所述，“达官”一词并不仅仅指的是蒙古，柴氏一族，存在是蒙古化党项人身份的可能性。

这支柴氏达官的世袭一直持续到了明末：弘治十四年柴昂继承柴武职务后，次年因故由庶兄柴堂袭职；柴堂之职则由未载明辈分的柴经继承，柴经官至以都指挥体统行事指挥同知；嘉靖二十九年(1550)，柴良弼继承柴经官职，因都指挥体统行事系虚衔，遂仍袭达官指挥同知。⁴² 柴良弼嘉靖三十年时推升为宣府镇长安所城守备，⁴³ 驻扎长安岭堡(在今怀来县王家楼乡)。但因在任期间“科索军人”，科敛索贿，问罪拟发烟瘴卫所差操惩戒，后来追赃、扣俸之后允许复职；万历十九年(1591)，柴良弼子柴九棘继承保定左卫达官指挥同知职务；万历三十一年柴九棘因疾病，由其子柴廷桂袭职；崇祯二年(1629)，柴廷桂因年老，由其子柴玺袭职。终明一代，从开始到崇祯时期的柴玺，柴家都享受着“达官不比”的优待。⁴⁴ 这应该是目前见于明代原始档案的与西夏遗民相关的代表性

40 刘浦江(1998)，「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大陆杂志(台北)》总第96卷第6期，第19-34页。

41 『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 9年 6月。

42 『保定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第259页。

43 [明]栾尚约 修，孙世芳 纂，嘉靖『宣府镇志』卷30「职官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第14a页。

44 『保定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第259页。关于达官不比的制度问题，延伸可读梁志胜(2012)，『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17-

家族。

除了柴氏家族以外，保定地区卫所达官中还有两支宁夏安氏家族也来自西北。西夏后裔有安姓。元至正五年(1345)北京居庸关六体石刻的西夏文『造塔功德记』中记有大都留守安赛罕(*An sayiqan*)，⁴⁵ 明刊本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助缘题记中有安豁朵只(*An qo dorji*)、安那颜帖木儿(*An noyan temür*)，说明西夏遗民应该有以安为姓的，且从元至明一直有部分党项人偏好用蒙古语起名。⁴⁶ 但是，保定的这两支安姓达官毕竟缺乏像柴氏家族那样切实的与西夏文化有联系的证据，姑且备录于此，以供参考。其中一支是卜答家族(改姓安)，一支是安志恭刺赤家族。卜答以“来降达达”归附，就近编入宁夏灵州千户所任正千户，累功指挥僉事，其子安失刺罕袭指挥僉事后调入保定左卫右千户所带俸，失刺罕生啁啰可，啁啰可生安文，安文生安宗，安宗生安璋，安璋生安春芳，安春芳职务由叔叔安相承袭，安相生安崇武，安崇武生安效忠，⁴⁷ 以上是这支卜答一族承袭职务的世系。

安志恭刺赤，明初以塔滩“来降达达”身份被直接编入宁夏地区卫所，授予宁夏左卫所百户职务，其子安台不花于永乐十一年(1413)袭宁夏左卫所百户，后调为保定左卫右所百户，子孙世袭达官：安台不花生安祥，安祥生安贤，安贤生安锡(锡将家族世职升至副千户)，安锡生安金(金将家族世职升至署正千户事副千户)，安金生安朝臣，安朝臣生安汝登，汝登职由叔叔相承袭，朝相职由汝登堂孙有明承袭。⁴⁸ 以上是安志恭刺赤一族的世系。

319页。

45 村田治郎 编著(1957)，『居庸关』第1卷，京都，京都大学工学部，第292页。

46 聂鸿音(2022)，「明代党项人的党项姓和蒙古名」，『西夏研究』第1期，第30-31页。

47 『保定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第261页。

48 『保定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第282页。

4. 余论

宁夏籍西夏皇室后裔出仕河北的说法是缺乏证据的, 不过, 明代河北地区确实有与党项相关的族群繁衍生息, 『选簿』中有关保定达官柴氏一族的记载, 从洪武初一直持续到崇祯朝, 应是明代河北地区与党项后裔有关族群的较晚记录。而这一群体在明中后期以后, 逐步更加融入汉文化中来, 这一点或可从柴家后世子孙取名的情况来看, 如柴良弼, 良弼典出『尚书·说命上』: “恭默思道, 梦帝赉予良弼, 其代予言。”孔传: “梦天与我辅弼良佐, 将代我言政教。”⁴⁹ 再如柴九棘, 典出『周礼·秋官·朝士』: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 孤卿大夫位焉, 群士在其后; 右九棘, 公侯伯子男位焉, 群吏在其后。”郑玄注: “树棘以为立者, 取其赤心而外刺, 象以赤心三刺也。”⁵⁰ 这些都不是普通名字, 而是古人常用的文化浓厚的汉名。作为祖先汉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的卫所达官, 后世子孙改取文质彬彬的姓名, 也能管窥其潜意识里受本土文化同化的一面。

党项后裔在面临元明易代的大变局下, 同其他族群一样, 或为民, 或为军, 不可避免地纳入到新王朝的户籍体系, 参与到各族群的密切交往中来。理解这一进程需要将不同选择下的西夏遗民家族从一桩桩个案做起, 逐步还原真实的历史图像。西夏遗民中文人出身较多的家族, 传承家谱、墓志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对比之下, 卫所武官尤其是达官群体留下的历史文献是较为稀少且分散的。就如本文所论的柴氏一族, 明初他们从西北塞外迁到保定落脚后, 繁衍数代, 为当地乃至九边军镇的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其留下的痕迹, 除了官方档案『选簿』, 也只剩下兴善寺的已佚碑刻与现存经幢。他们也是西夏遗民相关群体的重要部分, 应该钩沉索隐, 才能补上西夏遗民逐步与明朝各民族多元交融的碎片, 使后世更能理解西夏遗民相关族群与其他族群融合的历史进程。⁵¹

49 [西汉]孔安国传, [唐]孔颖达正义, 『尚书正义』卷10「说命上」, 收入[清]阮元校刻(1980),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第174页。

50 [东汉]郑玄注, [唐]贾彦彦疏, 『周礼注疏』卷34「秋官司寇第五·朝士」, 收入[清]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第877页。

参考文献

古籍

- 兵部档案『三万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兵部档案『宁夏前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兵部档案『保定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宋]刘昉编,[明]陈履端重辑,『幼幼新书(附拾遗方)』,明万历十四年古吴陈履端刻本。
- 『元典章』,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整理本(2011),中华书局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
- 『元典章』,洪金富校定本(2016),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
- [明]梁尚约修,孙世芳纂,嘉靖『宣府镇志』,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
- [明]朱榘编修,胡玉冰,孙瑜校注(2015),『(正统)宁夏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明]何乔远(1993),『名山藏』,南京:广陵古籍刻印社。
- [明]王玺编撰,焦振廉等校注(2016),『医林类证集要』,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明]俞本撰,李新峰笺证(2015),『纪事录笺证』,北京:中华书局。
- [清]黄玉衡修,[清]贾昶纂,『(乾隆)重修和顺县志』,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刻本。
- [清]李培祐等修,[清]张豫垵等纂,『(光绪)保定府志』,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 [清]张金城修,[清]杨浣雨纂,陈明猷点校(1992),『(乾隆)宁夏府志』,宁夏人民出版社。
- [清]张澍辑,今人周鹏飞等点校(1988),『凉州府志备考』,西安:三秦出版社。

【碑刻】

- 「保定莲池明代西夏文经幢」,保定市莲池书院藏碑刻。
- [明]李应策,「明故文林郎刑科都给事中泰和侯公墓志铭」,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碑刻。
- [明]郝汝孙,「合龙山新建玄帝行宫碑记」,载韩学亮(2017),『绥德古代碑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76页。
- 「头道关东四楼修城碑」,怀柔区文化委员会主编(2018),『怀柔明代长城』,北京:燕山出版社,第134页。
- 「隆庆四年修城碑之二」,『怀柔明代长城』,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第147页。
- 「滦平县隆庆四年戚继光张永安鼎建碑」,载向燕南主编(2016),『中国长城志·文献下』,南京,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第2338页。
- 「河北怀来样边长城鼎建碑」,载向燕南主编,『中国长城志·文献下』,第2338页。

51 本文的写作,幸蒙聂鸿音先生拨冗指教其中纰漏,方得修改完善,亦蒙三位审查委员详细意见,一并致以深深谢意!

论著

- 多洛肯(2018), 「民汉文化交融中的元代唐兀氏文人群体」,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 村田治郎 编著(1957), 『居庸关』, 京都: 京都大学工学部。
- 陈瑞青·郭兆斌(2023), 「明代西夏遗民的最晚记录: 晋州明代西夏后裔遗迹考」, 『西夏研究』第1期。
- 邓文韬(2022), 『元代唐兀人研究』,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 杜建录(2015), 『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杜建录·邓文韬(2022), 『党项与西夏碑刻题记』, 西安: 三秦出版社。
- 梁志胜(2012), 『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刘浦江(1998), 「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 『大陆杂志(台北)』总第96卷第6期。
- 聂鸿音(2022), 「明代党项人的党项姓和蒙古名」, 『西夏研究』第1期。
- 聂鸿音(2022), 「保定莲池公园所存西夏文“胜相经幢”考」, 郭健 主编, 『燕赵文化研究』7,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彭勇(2009), 「明代忠顺营史实初识」,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2辑。
- 奇文瑛(2011), 『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 以辽东和京畿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史金波·白滨(1977), 「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 『考古学报』第1期。
- 王连起(2018), 『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王连起卷』, 北京: 故宫出版社。
- 杨富学(2022), 『述善集与河南濮阳西夏遗民研究』,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 张琰玲(2019), 『西夏遗民文献整理与研究』, 南京: 凤凰出版社。
- 张琰玲(2018), 「百年西夏遗民研究综述」, 『西夏研究』第3期。
- 杨富学(2004), 「20世纪西夏遗民研究」, 载杜建录 主编, 『二十世纪西夏学』,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赵现海(2011), 「洪武初年甘肃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政策」, 『古代文明』第1期。
- 郑绍宗·王静如(1977), 「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 『考古学报』第1期。
- 周松(2012), 「从蒙古草原到华北平原, 明朝忠顺营源流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
- 周松(2011), 「明朝对近畿达官军的管理: 以北直隶定州、河间、保定诸卫为例」, 『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
- 周松(2009), 「塔滩新考」,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
- 西田竜雄(1997), 『西夏王国の言語と文化』, 岩波書店。
- Nie, Hongyin (2023), “Tangut Pillars of Uṣṇiṣavijayā in Baoding Prefecture: The Last Monuments of Xixia Descendants,” *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Vol. 9, No. 2, pp. 3-26.

ABSTRACT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Xixia Descendants among the “Da Guan” in Baoding Garrisons

Xu, Cheng*

Recently, academic circles have put forward the view that the latest descendant of Xixia in Hebei area is Li Fen, who was active in Jinzhou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but this view is based on the misreading of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tele inscriptions, so it needs to be discussed again. Although this statement is problematic, 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are ethnic groups related to the descendants of the Xixia Dynasty in Hebei Province. For example, among the military officers in Baoding, Hebei Provinc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re was a “Da Guan” Chai family who had close contacts with the descendants of the Xixia Dynasty. The Chai family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ie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Xingshan Temple, and many of their family names appeared on the Xixia inscriptions in Xingshan Temple.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Mongolian and Semu adherents of the Yuan Dynasty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garrison, and their military officers were called “Da Guan.” Among the “Da Guan” in Baoding area of Hebei Province, there are the Chai and An families

* Ph.D. Candidate,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who moved in from the northwest beyond the Great Wall. Among them, the Chai cla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Xingshan Temple in Baoding, and there were people in the clan who gave alms to build the temple, and there were also clansmen who were listed in the Xixia Sutra Building. The Chai clan may be Mongolians who had deep contacts with the adherents of the Xixia Dynasty, or even the descendants of Dangxiang. The succession of these dignitaries lasted until the Chongzhen period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ich was a representative group of people associated with the Xixia Dynasty recorded in the original archives of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Hebei Baoding, Weisuo, “Da Guan”, Xixia, Mongolian